

1921谁主沉浮

孔庆东 著



孔庆东文集

孔庆东
著

1921谁主沉浮

重庆出版集团  重庆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1921 谁主沉浮 / 孔庆东著. — 重庆: 重庆出版社, 2009.12

ISBN 978-7-229-01296-0

I. ①1… II. ①孔… III. ①文学思想史 - 中国 - 1921 ~ 1925 IV. ①I209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185400 号

1921 谁主沉浮

1921 SHUIZHU CHENFU

孔庆东 著

出版人: 罗小卫

策 划: 华章同人

特约策划: 贺鹏飞

责任编辑: 陈建军

特约编辑: 黄卫平

封面设计: 灵动视线·张莹



重庆出版集团
重庆出版社

出版

(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)

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公司 发行

邮购电话: 010-85869375/76/77 转 810

E-MAIL: sales@alphabooks.com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640mm × 960mm 1/16 印张: 15 字数: 150 千

2009年12月第1版 2009年12月第1次印刷

定价: 31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致电023-68706683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目 录

序章 撕开的黎明：狂飙为谁从天落 1

一 地火在运行：乱世图景 15

十次地震——五灾俱全——兵荒马乱——南北对峙——内忧外患

二 组织起来：计划文学的萌芽 31

文学研究会——创造社——其他文学社团

三 革命还是毁灭：沉重的小说 47

《沉思》——《沉沦》——《命命鸟》——《阿Q正传》

四 “我把日来吞了”：繁丽的新诗 67

《女神》——《湖畔》——《繁星》——《红烛》

五 大幕为谁开：戏剧在“民众”与“艺术”之间 95

民众戏剧社——北京实验剧社——人艺剧专——上海戏剧协社——
艺专戏剧系

六 梦醒之后：散文在“战斗”与“闲适”之间 115

随感录——语丝体——美文——闲话——冰心体

七 礼拜六的欢歌：调整期的通俗文学 147

言情——黑幕——武侠——侦探——青社——星社

八 潜龙勿用：襁褓中的革命文艺 182

共产党——革命文学——《饿乡纪程》——《赤都心史》——《新
梦》——《哀中国》

九 万类霜天竞自由：文化镜头剪辑 209

无政府主义——宗教——艺术——教育——科技

年表（1921—1925） 221

参考文献 231

后记 233

序章 撕开的黎明： 狂飙为谁从天落

公元 1919 年 5 月 3 日的深夜，国立北京大学雄浑而沉重的红楼内，灯火通明，人声鼎沸。礼堂内外挤满了北京各高等学校的学生代表。一位名叫邵飘萍的记者朗声道：“现在民族命运系于一发，如果我们再缄默等待，民族就无从救亡，而只有沦亡了。北大是全国最高学府，应当挺身而出，把各校同学发动起来，救亡图存，奋勇抗争。”众人听了，悲愤交加，有的顿足捶胸，痛哭失声。一个学生走上前去，激动得说不出话，只见他“吱啦”一声，撕下一大块衣襟，举起中指，一咬而破，挥指在衣襟上血书下四个大字：“还我青岛”。

第二天，便爆发了响彻整个中国 20 世纪的五四运动。

如果说“五四”是 20 世纪中国的黎明，那么这个黎明到来的时候，20 世纪已经过去了将近五分之一。黎明

期究竟有多长，从未有人界定过。假如没有呼唤，没有呐喊，黎明会不会自动到来？当人们呼喊过，撕裂过，冲锋过，仆跌过之后，这便成了一个值得冷静思考的课题。

“五四”的意义，远非赵家楼的一把火所能概括。如果站在“五四”高潮甫歇的1921年来近距离地回望“五四”，就会发现，刚刚过去的五六年，已然从文化穹庐上撕下了一块遮天蔽日的血腥之幕，这才使得20年代的中国，开始呈现出一片“初日照高林”的早春气息。所谓“五四”，并不是公元1919年春夏之交的一个日子，而是古老的中华文明“灵童转世”，进入一个生机勃勃的崭新文化时代的胎动期。

提到“五四”，人们都会想起鲁迅、胡适、陈独秀、李大钊。但还有一个同等重要的名字决不能忘记，那便是蔡元培。

蔡元培(1868—1940)，字鹤卿，一字子民，浙江绍兴人，著名民主革命家和教育家。他并不是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，但却是这场运动最有力的支持者。1916年，蔡元培到北京大学担任校长。他对北大进行了一系列整顿改革，实行教授治校，鼓励学术研究，为新文化运动开辟了一个宽广良好的言论空间。

蔡元培说：“北大者，为囊括大典，包罗万众之最高学府。”他的办学方针是：“循‘思想自由’原则，取兼容并包主义。”“无论何种学派，苟其言之成理，持之有效，尚不达自然淘汰之命运者，虽彼此相反，而悉听其自由发展。”

蔡元培的治校方针，实际上为新思潮、新文化开拓了阵地。他当了北大校长后就聘请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陈独秀任文科学长，李大钊为图书馆主任。还有胡适、刘半农、钱玄同、周作人、鲁迅以及一批留学回来的自然科学家都曾到北大任教。但同时，北大也有一批以刘师培、辜鸿铭为代表的所谓旧派教授。经常有这样的情况，上一节课的教员西装革履，下一节课的教员则长袍马褂。比如辜鸿铭，他讲的是英国文学，脑后却拖着一条辫子，因为他是拥护满清帝制的……

事实上，绝对平等的空间是不存在的，任何平等都必然有其现实倾

向性。在蔡元培这位国民党元老的“平等空间”里，实际获益的乃是一批中国共产党开天辟地的领导人。

中国共产党第一任总书记陈独秀(1879—1942)，字仲甫，安徽怀宁人。早在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前，他就已经是文化界赫赫有名的领袖人物，以至于一些害怕他、仇视他的人把他叫做“陈独兽”或“陈毒蝎”。他在1904年创办《安徽俗话报》，致力于唤醒民众。曾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，参加辛亥革命。在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斗争中，陈独秀被捕入狱，险些遇难。虽然共和代替了帝制，但萎靡不振的五色旗下，整个国家仍处于内忧外患的交相煎熬之中。一次次革命的失败，使陈独秀为代表的一代知识分子陷入苦苦的思索之中。陈独秀认为，以往的历次运动，都是自上而下的政治革命，而中国要成为真正的现代强国，需要一场自下而上的普遍的国民思想革命。

1915年9月，《青年杂志》在上海创刊，五四新文化运动由此揭开了序幕。《青年杂志》从第二卷起改名《新青年》，随主编陈独秀迁至北京大学，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最重要核心刊物。

陈独秀在创刊号上发表《敬告青年》一文，指出新陈代谢是宇宙间的普遍规律，“人身遵新陈代谢之道则健康，陈腐朽败之细胞充塞人身则人身死；社会遵新陈代谢之道则隆盛，陈腐朽败之分子充塞社会则社会亡。”由此向青年提出六点希望：

- 一、自由的而非奴隶的。
- 二、进步的而非保守的。
- 三、进取的而非退隐的。
- 四、世界的而非锁国的。
- 五、实利的而非虚文的。
- 六、科学的而非想象的。

这六点希望包含了民主、科学、开放、革新等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。

陈独秀号召 20 世纪的青年，彻底清除做官发财思想，“精神上别构真实新鲜之信仰”。他主张当今的教育方针是：

第一，当了解人生之真相。

第二，当了解国家之意义。

第三，当了解国家与社会经济之关系。

第四，当了解未来责任之艰巨。

陈独秀期望培养出一代“意志顽狠，善斗不屈，体魄强健，力抗自然，信赖本能，不依他为活，顺性率真，不饰伪自文”的新国民。

在《我之爱国主义》一文中，陈独秀指出：

今日之中国，外迫于强敌，内逼于独夫……而所以迫于独夫强敌者，乃民族之公德私德有以召之耳，试观国中现象，若武人之乱政，若府库之空虚，若产业之凋零，若社会之腐败，若人格之堕落，若官吏之贪墨，若游民盗匪之充斥，若水旱疫病之流行；凡此种种，无一不为国亡种灭之根源。

由此，陈独秀提倡“勤、俭、廉、洁、诚、信”几个大字，作为“救国之要道”。

一旦发生了亡国灭种的危机，那么，不论这个文明曾经有过怎样的光荣，都不能不使人深刻反省它的积弊。

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将近 80 年的时间里，中国人一方面努力变法图存，另一方面也努力用自己的传统文化去抗击和消解外来的西方文化。齿轮上的新油和旧泥交融在一起，挂钟上的 1234 和子丑寅卯并列在一起，北洋水师的德国大炮上晾晒着禽飞兽走的大清官服……中学为体、西学为用的理论使许多人仍旧沉醉在中华文明天下第一、外国鬼子都是无君无父的禽兽的迷信之中。

然而，洋务运动搞了几十年，中国还是一次接一次地战败。圆明园的火光中，大清士兵被砍瓜切菜般屠杀的哀号和叫骂中，不平等条约像雪片一样地堆积起来。义和团运动几乎把所有的中国传统文化都抬了出来，从孔子的“尊王攘夷”，到佛家的如来济世；从阴阳五行八卦，到画符念咒作法；从桃园三结义，到唐僧四师徒。集合了姜太公、诸葛亮、赵子龙、岳飞、梨山老母、西楚霸王、九天玄女、托塔天王、济公、武松、黄天霸、秦琼、杨家将、观音菩萨直到玉皇大帝这样一支强大得无以复加的队伍。结果，还是一败涂地。这便使 20 世纪初年的有识之士认识到：对于我们所珍爱的文化传统，必须进行一番认真的清理和变革了。鲁迅说：“不能革新的人种，也不能保古的。”但是，这一本来并不深奥的道理，中国人直到今天也并不明白。能够怀着“保古”的目的去“革新”，就已经算是开明之士了。于是，大多数人都感到了“撕裂”。

其实，就在“五四”前后，统治中国人大脑的，还是纲常名教和鬼狐报应。辛亥革命驱逐了满族的皇帝，但并未触及中国人大脑中的皇帝。1916 年袁世凯要称帝，1917 年张勋要复辟，这些“壮举”并非是毫无民意基础的纯闹剧。拥护帝制的壮士中，不乏辛亥革命的功臣。曾经被视为激进党的康有为，此时却大力宣传要把孔教定为国教、列入宪法。在失去了皇帝的人心惶惶中，人们对心中的皇帝的依赖变得更急迫、更虔诚了。陈独秀在《旧思想与国体问题》一文中说：“腐旧思想布满国中，所以我们要诚心巩固共和国国体，非将这班反对共和的伦理文学等旧思想，完全洗刷得干干净净不可。否则不但共和政治不能进行，就是这块共和招牌，也是挂不住的。”

针对各地兴起的祭孔读经热潮，五四新文化运动集中锋芒批判了这股逆流。最早反对把孔子学说定为一尊的文章是易白沙的《孔子平议》，随后更多的人投入进来。巴金和茅盾等人的小说里，描写过“五四”时期闭塞保守的四川人文景观。就在此时的四川，却产生了一位大名鼎鼎的批孔急先锋，他的名字叫吴虞。

吴虞（1872—1949），字又陵，四川新繁人。他 1905 年留学日本，

回国后在成都任教。《新青年》最初发行到成都时，只有5份，吴虞和他的学生各买了1份。吴虞深深地为《新青年》所吸引，积极投身这场文化变革。他发表了《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》、《儒家主张阶级制度之害》、《辨孟子辟杨墨之非》、《对于祀孔问题之我见》、《吃人与礼教》等文章，对封建旧文化旧礼教进行严厉的批判。他说：

二十四史，徒为帝王之家谱，官吏之行述，陈陈相因，一丘之貉。……知有君主而不知有国家，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，恢张君权，崇闡儒教，于人民权利之得失，社会文化之消长，概非所问。历史即为朝廷所专有，于是舍朝廷之事，别无可记。

呜呼！孔孟之道在六经，六经之精华在满清律例，而满清律例则欧美人所称为代表中国尊卑贵贱阶级制度之野蛮者也。

天下有二大患焉：曰君主之专制，曰教主之专制。君主之专制，铃束人之言论；教主之专制，禁锢人之思想。君主之专制，极于秦始皇之焚书坑儒，汉武帝之罢黜百家；教主之专制，极于孔子之诛少正卯，孟子之拒杨墨。

吴虞犀利地指出了儒教与专制的关系，特别对封建统治者借做护命符的孔子学说进行了勇敢的质疑和批判，打破了封建圣人的偶像，因此被胡适称为“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。”

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中的“南陈北李”，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。李大钊(1889—1927)，字守常，河北乐亭人。他发表的《孔子与宪法》、《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》、《乡愿与大盗》等文，反对把孔教列入宪法，指出儒家“三纲”是“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”，是“专制政治之灵魂”。但同时李大钊说明：“余之诘击孔子，非诘击孔子之本身，乃诘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也。”

其实这是新文化运动先驱们的共识。他们都认为孔子本人在历史上是圣哲，是伟人。陈独秀曾规劝青年要以孔子、墨子为榜样，吴虞也说

过孔子是当时之伟人，李大钊说孔子是其生存时代之圣哲，其学说亦足以代表当时之道德。还说孔子如果活在今天，会创造出新的学说以适应现代社会。可见他们并非像今天一些无知学者凭空想象的那样全盘否定孔子，而是认为孔子的许多思想不适应于今天，并且儒家只是百家中的一家，不能定为一尊，陈独秀、易白沙、吴虞等人都很推崇墨子的思想。在“五四”先驱的意识里，国学的范围要比孔学的范围大得多。在今天，特别应该纠正的是，“五四”时代并没有“打倒孔家店”这句被后人误传的口号。实际上五四新文化运动是由多种思潮组成的，有比较激进的，例如《新青年》；有比较保守的，例如学衡派，但学衡派也是赞成改革的；还有主张兼容并包的，例如蔡元培。他们都主张改革传统文化，但谁也没有完全否定和抛弃传统文化。

陈独秀说：“孔教为吾国历史上有力之学说，为吾人精神上无形统一人心之具，鄙人皆绝对承认之，而不怀丝毫疑义。”

“我们反对孔教，并不是反对孔子个人，也不是说他在古代社会无价值。不过因他不能支配现代人心，适合现代潮流，还有一班人硬要拿他出来压迫现代人心，抵抗现代潮流，成了我们现代进化的最大障碍。”

吴虞也说：“我们今日所攻击的乃是礼教，不是礼仪。”

新文化运动猛烈地抨击旧思想旧道德，大力介绍自由平等学说、个性解放思想、社会进化论等各种西方思潮，尤为突出地高举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。根据民主（Democracy）、科学（Science）两词的译音，当时又称为“德先生”与“赛先生”，“五四”先驱们认为，中华文明所急需输入的新鲜血液非这两位先生莫属。陈独秀在《新青年》六卷一号发表《本志罪案之答辩书》，表示“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，一切政府的压迫，社会的攻击笑骂，就是断头流血，都不推辞。”

正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千钧棒所扫出的一片玉宇中，文学革命的朝阳喷薄而出了。

李大钊在他担任总编辑的《晨钟报》创刊号上说：

由来新文明之诞生，必有新文艺为之先声，而新文艺之勃兴，尤必赖有一二哲人，犯当世之不韪，发挥其理想，振其自我之权威，为自我觉醒之绝叫，而后当时有众之沉梦，赖以惊破。

文学是思想文化、伦理道德的重要载体，要革新旧文化，就必须革新旧文学。

陈独秀说：

要拥护那德先生，便不得不反对礼教、礼法、贞节、旧伦理、旧政治。要拥护那赛先生，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，旧宗教，要拥护德先生，又要拥护赛先生，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。

于是，一场反对文言、提倡白话，反对旧文学、提倡新文学的文学革命势不可免地发生了。这里，需要介绍那位著名的绅士派领衔主演了，他就是在北京大学当过校长、文学院院长和五个系的系主任，在全世界获得过几十个名誉博士头衔，热心搜集五大洲怕老婆的故事，还曾经梦想出任中华民国总统的胡适。

胡适(1891—1962)，字适之，安徽绩溪人。在安徽这块旧文学的正宗——桐城派的风水宝地上，却产生了胡适和陈独秀这样两位旧文学的掘墓人。陈独秀被骂为“独兽”、“毒蝎”，胡适之这个名字则被一位著名的大学者在出试题时用做“孙行者”的下联，因为“獠”与“猕”都是猴子的意思。总之是不属于人类。而在古文大师林琴南的影射小说《荆生》中，胡适的名字叫做“狄莫”，“狄”与“胡”，都是蛮夷之辈，总之还是非我族类。就是这两位被许多人视为轻浮少年的一胡一陈，共同揭起了文学革命的中军大旗。

1917年1月，胡适在《新青年》上发表了《文学改良刍议》，提出“吾以为今日而言文学改良，须从八事入手”。这“八事”是：

- 一、须言之有物。
- 二、不模仿古人。
- 三、须讲求文法。
- 四、不作无病之呻吟。
- 五、务去滥调套语。
- 六、不用典。
- 七、不讲对仗。
- 八、不避俗字俗语。

这“八事”被陈独秀称赞为“今日中国文界之雷音”。

陈独秀随后发表了态度更为明确坚决的《文学革命论》，“以为吾友之声援”。陈独秀气宇轩昂地提出了著名的三大主义：

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，
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，
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，
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，
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，
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。

陈独秀的三个“推倒”，并不是全面否定古代文学。他所要推倒的古典文学，其实是指仿古的文学。就在《文学革命论》这篇文章里，陈独秀用了大量文字赞美古典文学的优秀部分，说《诗经》中的“国风”、楚辞都是“斐然可观”的，魏晋以下之五言，改变堆砌之风，在当时可谓文学的一大革命，韩柳崛起，一洗前人纤巧堆砌之气，元明剧本、明清小说，“乃近代文学之斐然可观者”。他主要批判的是六朝的靡丽文风、明代一味仿古的前后七子，以及桐城派的一些人物，称这些无病呻吟的人为“十八妖魔”。

胡适、陈独秀的文学革命主张提出后，得到了钱玄同、刘半农、周作人、鲁迅等人的积极响应。

钱玄同(1887—1939)，号疑古，自称疑古玄同，浙江吴兴人，文字音韵学家。刘半农(1891—1934)，原名刘复，江苏江阴人，文学家和语言学家。钱、刘二人为了使文学革命激起更大的反响，发表了著名的“双簧信”。由钱玄同化名王敬轩，汇集了各种攻击新文学和白话文的言论，致信《新青年》，然后由刘半农作《复王敬轩书》(即《奉答王敬轩先生》)，逐条进行批驳。这个子虚乌有的王敬轩，不但代表了顽固守旧派的观点，而且还引起了不少复古思想者的共鸣。

近代著名学者、翻译家林纾发表《荆生》、《妖梦》两篇小说，攻击新文化运动是“禽兽之言”。又发表《致蔡鹤卿书》，规劝蔡元培保全名教，说“大学为全国师表，五常之所系属”，不应该“覆孔孟，铲伦常”。又说如果提倡白话文，那么小商小贩就都可以当教授了。

蔡元培回答说，伦常有五：君臣、父子、兄弟、夫妇、朋友，北京大学除了反对封建君臣这一伦外，“从未有以父子相夷、兄弟相阅、夫妇无别、朋友不信，教授学生者”。北大还有一个进德会，其基本戒约有不嫖、不纳妾等，这都是与孔孟之道不相违背的。

蔡元培又说，北京大学也没有“尽废古文而专用白话”，国文课本、中国文学史和文字学讲义，都是文言。

当一位日本学者指责北京大学不尊孔子、废除讲经时，蔡元培答道：“北大崔适教授讲《五经要义》、《春秋复始》，陈汉章教授讲《经学通论》，黄节、沈尹默教授讲《诗经》，梁漱溟教授研究孔家哲学，北大何尝废讲经？”不过北大对于各家学说“均一视同仁”，这才是北大的胸怀。

李大钊则发表了《新旧思潮之激战》，认为“宇宙的进化，全仗新旧二种思潮，互相挽进，互相推演，仿佛像两个轮子运着一辆车一样；又像一个鸟仗着两翼，向天空飞翔一般。我确信这两种思潮都是人群进化必要的，缺一不可。……我又确信这二种思潮，一面要有容人并存的

雅量，一面更要有自信独守的坚操。”

时代的要求，加上先驱者的奋争，白话文学的主张取得了胜利。

1920年，北洋政府教育部正式规定白话为“国语”，通令全国中小学采用白话课本。从那时开始，中国儿童的启蒙教育不再是他们似懂非懂的“天地玄黄，宇宙洪荒”和“上大人孔乙己”，而是他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上最适合于他们的东西。

白话文运动并不是文学革命的全部。李大钊在《什么是新文学》一文中说：

我的意思以为刚是用白话作的文章，算不得新文学；刚是介绍点新学说、新事实，叙述点新人物，罗列点新名词，也算不得新文学。

鲁迅说，白话文学“倘若思想照旧，便仍然换牌不换货”。

所以，新文学的建设没有停留在胡适所讲的“国语的文学，文学的国语”的要求上，而是进一步致力于文学内容的革新。在这方面作出了不可替代的巨大贡献的，就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著名的周氏兄弟。

周氏兄弟是浙江绍兴人，长兄周树人（1881—1936），笔名鲁迅等，二弟周作人（1885—1967），笔名知堂等。这兄弟二人的思想和文字，对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“树人”和“作人”，产生了磁化般的影响。

周作人在文学革命中发表了《人的文学》和《平民文学》等重要文章，提出要从“灵肉一致”的生活角度去创造“人的文学”、“人性的文学”、“个人的文学”，又提出文学“为人生”的主张。他说：

我们不必记英雄豪杰的事业，才子佳人的幸福，只应记载世间普通男女的悲欢成败。

周作人提出“以真为主，美即在其中”的艺术主张，这是对虚伪粉

饰的仿古文学的有力矫正。20 世纪的中国文学中，“纯美学”、“纯艺术”的倾向始终不能占据主流，这与本世纪中国直面现实的需要高于一切是密切相关的。

鲁迅在新文化运动中也发表了一系列深刻犀利的文章，猛烈抨击封建伦理道德，为文学革命呐喊助威。鲁迅以他坚定清醒的现实主义立场和坚韧持久的战斗精神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流砥柱和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的精神代表。而在新文化运动初期，鲁迅影响最大的则是他的文学创作实绩。

1918 年 5 月，《新青年》开始全部采用白话。鲁迅就在这一期上发表了新文学小说的奠基之作《狂人日记》。这是一篇反对封建礼教的战斗檄文，小说中的“狂人”象征着一代还不能被多数民众理解的文化先觉者，是一个英勇孤独的战士。他通过痛苦的反思，得出了一个振聋发聩的结论：封建宗法制度“吃人”。小说结尾，说将来的社会“容不得吃人的人”。鲁迅沉痛地写道：

没有吃过人的孩子，或者还有？

救救孩子……

鲁迅在《狂人日记》之后，“一发而不可收”，写出了《孔乙己》、《药》等著名小说，深刻揭示了封建传统思想给人们造成的精神创伤。他解剖中华民族国民性的弱点，意在暴露社会的病根，以引起疗救的注意。几年后，他把自己这一时期的小说结集时，取名《呐喊》。“呐喊”二字，正是“五四”黎明期总体姿态的写真。那声音，直到 1921 年前后，还依然嘹亮。

在这片刚刚撕开的天宇上，一双双幼稚的手开始勇敢地“涂鸦”了。刚写了几首《老鸦》、《鸽子》和“两个黄蝴蝶，双双飞上天”的胡适，1919 年居然写出了《谈新诗》，还发表了一部独幕剧《终身大事》。1918、1919 两年，《新青年》、《每周评论》连环掌般推出了一系列战斗